

从书籍出版看国势兴衰

——中外古今书籍出版之对比分析

China's Publications, Past and Present

郑也夫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本文虽题为“中外古今之对比分析”, 实际上只准备从一个维度——数量去描述和分析。在考察历史上书籍出版的数量时几乎仅涉及“种数”, 这既是因为古代的“印数”更难考察, 也是因为“种数”更代表了从古至今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信息量。在考察我国近40年的出版状况时, 将兼及种数、印数等。

一、20世纪以前的书籍种数统计

1. 中国的书籍统计

从先秦至清代, 跨时3 000年, 其间又经历了竹简、帛书、纸张、抄本、印刷的变迁, 要统计出这期间共出了多少种书籍实为艰难, 且鲜有学者从事这一工作。因此辞书大师杨家骆40余年前对中国古代著作种数的统计既难能可贵, 且至今尚后继无人。我们只有延用杨家骆的数字, 从而对中国古代图书名数有一总的概念(见表1)。

必须说明的是, 杨氏统计的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全部著作之名数。他的根据是历代正史中艺文志、经籍志及清儒的补志志补。而经过历代难以计数的天灾人祸, 很多著作未能流传下来。清代集中国图书之大成的《四库全书》中著录书仅3 457部, 存目书6 766部, 合计不过11 996部。虽决不可以为《四库全书》将中国流传至当时的著作囊括无遗, 但它收容量上的巨大缺口也说明了, 古代的书籍传至清代时恐仅十存二三。在使用杨氏数字与外域比较时应记取此点。但是另一方面, 一个历史上产生过众多著作的民族, 即使有大量的遗失, 也毕竟极大地不同于一个原本就只产生过少许著作的民族。书籍未能流传下来是莫大的损失, 但它毕竟曾经产生过影响, 并在某种程度上汇入了后

人的思想和著作中, 即使它本身已不存在。因此, 统计出全部著作名数, 包括那些已不复存在的, 在文化学的意义上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表1 清代以前中国著作名数统计

时代 ⁽¹⁾	部数	卷数	无部数卷数
西汉及其前	1 033	13 029 ⁽²⁾	408
东汉	1 100 ⁽³⁾	2 900 ⁽³⁾	 ⁽⁴⁾
三国	1 122	4 562	
晋	2 438	14 887	
南北朝	7 094	50 855	764
唐	10 036	173 324	547
五代	770	11 750	
宋	11 519	124 919	316
西夏辽金元	5 970	52 891	305
明	14 024	218 029	728
清	126 649	1 700 000 ⁽³⁾	
总计	181 755	2 369 046	3 068

杨家骆原注: (1) 各代收书范围互有不同处, 已见前文。(2) 篇卷互用。(3) 约数。(4) 非无卷数之书也, 特于总数中未析出无从核计耳。

2. 西方的书籍统计

自有史以来至19世纪末叶, 西方世界出版书籍种数, 也鲜有人作出统计。我们只勉强找到了当代学者麦克格雷对那时书籍种数所作的粗略的估算(见《信息环境的演变》,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44、85、86页)。他说:

“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者)以前的若干世纪中, 欧洲大约有3万种图书。古腾堡之后的150年, 即到1600年, 大约出版了125万种图书, 1700~1800年, 大约有200万种, 1800~1900年, 欧洲有800万种新书。”

但是,这位作者忘记了估算1600~1700年间的书籍种数,若根据前后发展估算为100万种左右的话,则总计起来,有史以来到1900年,欧洲共有图书1 200多万种。

3. 中西比较

综合上述两项统计,我们可以对同期中西方的书籍种数作出一比较(见表2)。

表 2 20 世纪前中西书籍种数对比

西 方		西方:中国	中 国	
年代	图书种数		图书种数	年代(朝代)
1450 年以前	30000	0.73:1	40782	1368 年以前(元代以前)
1450~1600	1250000	89:1	14024	1368~1616(明代)
1600~1900	1125 万	89:1	126649	1616~1911(清代)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到,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信息储量几乎可以同整个欧洲抗衡,因此中国文化才赫然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而自1450年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后,中西方在信息生产和储备上的势态急剧逆转。不仅当时的人们,甚至今天的历史学家们,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铅字、符号、图书量早已决定了19世纪中叶中西文明碰撞的结局。当西方人在书籍数量上占压倒优势后,它居于世界主流文化的位置,便只是时间问题了。至此我们不能不思考,在当今计算机、卫星大量传播信息的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动作以免重蹈历史复辙这一严肃课题了。

二、20世纪图书种数统计

1. 中国图书统计

清代以前中国图书名数在前一节中已作了交待。自1911年至1949年9月,我国共出版汉文图书10万余种(参阅《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49年至199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包括课本,不包括图片)63万种(不包括重印)。加上杨家骆统计的清代以前著作名数(18万种),我国自古至今,共出版过图书约92万种。

2. 世界图书统计

表 3 世界书籍出版种数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世界	269000	332000	426000	521000	572000	715000	798500	834500
非洲	3000	5000	7000	8000	11000	12000	13000	12000
美洲	25000	35000	77000	105000	121000	142000	154000	154000
亚洲	54000	51000	61000	75000	88000	138000	189000	200000
欧洲	186000	239000	260000	317000	343000	411000	430000	456000
大洋洲	1000	2000	5000	7000	9000	125000	12000	12000

资料来源: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0~1990.

根据年增长趋势推算总计,自1950年至1990

年,全世界出版书籍大约2000万种(见表3)。

上节说明,1900年以前,西方世界出版书籍1 200多万种。再加上1900至1950年世界出版书籍(估计近1 000万种),以及1900年以前西方以外地区出版的书籍(估计200万种左右),我们估计全世界有史以来共出版过书籍超过4000万种。美国学者斯洛特在70年代中期估计“世界上大约有3 500~4 000万种不同的图书”(见《图书馆藏书剔除》,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28页)。肯特(1979)认为“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大约出版过3 000万种著作。”(见汤普森《图书馆的未来》,书目出版社,1988第4页)。这些估算与我们的认识大致相仿。

3. 中国与世界之比较

有史以来,中国共出版书籍约92万种(未计算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世界共出版书籍约4 000万种,中国书籍占世界书籍的2.3%。

表 4 中国出版书种数占亚洲及世界出版书总数的比例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88
世界	269000	332000	426000	521000	572000	715000	798500	834500
亚洲	54000	51000	61000	75000	88000	138000	189000	200000
中国	19123	27940	17047	3732	11061	19109	40265	60164
中国: 世界 (%)	7.1	8.4	4.0	0.7	2	2.7	5.0	7.2
中国: 亚洲 (%)	35	55	28	5	13	14	21	30

资料来源: 世界及亚洲数字来自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0—1990.

表 5 中国出版书种数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1950	1960	1970	1980	1988
苏联	43060	76064	78899	80676	83011
美国	11022	15012	79530	76976	
西德	14094	21103	45369	64761	68611
英国	17022	23783	33441	48069	
日本	13009	23682	31249	45496	36346
法国	11849	11872	22935	32318	39026
中国	6408	14848	2088	13366	60164
韩国		1618	4207	20978	
印度		10741	14145	13148	14408
波兰	5218	7305	10038	11919	
丹麦	2866	3531	5052	9256	11129
捷克	4990	7930	9041	11647	9558
香港			723	4851	

资料来源: Unesco, Statistical rearbook, 1960~1990. .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出版书种数在亚洲及世界出版书种数中所占比例见表4。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出版图书种数与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见表5。

三、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困境与问题

书籍种数是一个民族出版与文化发达繁荣最重要的指标,而书籍的印数则是仅次于种数的,反映出出版的繁荣与文化的普及的又一重要指标。

我国1949~1990年书籍种数、印数、印张数见表6。

表6 1952—1990年书籍种数、印数、印张统计

年 份	种 数		印数 (亿册)	印张 (亿印张)	每种书 平均印数 (万册)
	合 计	其中: 新出			
1952	11,779	6,799	2.90	7.60	2.5
1955	18,573	11,694	5.45	15.68	2.9
1960	23,227	14,848	6.91	18.75	3.0
1965	12,566	8,536	10.06	27.45	8.0
1967	1,539	1,066	18.82	60.86	122.3
1970	2,642	2,088	7.99	20.97	30.2
1975	7,752	6,684	17.60	57.29	22.7
1977	7,374	6,436	15.11	75.54	20.5
1978	8,941	7,594	11.57	55.84	12.9
1979	11,136	9,524	12.91	69.98	11.6
1980	15,669	13,366	19.10	102.44	12.2
1981	18,776	15,338	28.31	125.55	15.1
1982	23,957	18,648	29.88	125.72	12.5
1983	26,573	20,156	26.88	129.68	10.4
1984	29,346	22,007	30.86	155.46	10.5
1985	34,106	26,501	34.77	171.39	10.2
1986	39,152	31,457	20.79	111.95	5.3
1987	45,164	34,041	29.16	147.65	6.5
1988	49,449	37,342	30.78	155.20	6.2
1989	57,476	45,434	28.48	132.16	5.0
1990	61,563	44,902	26.97	124.23	4.4

表中统计资料所显示的中国40年来出版业的发展变迁中,最突出的是这样两个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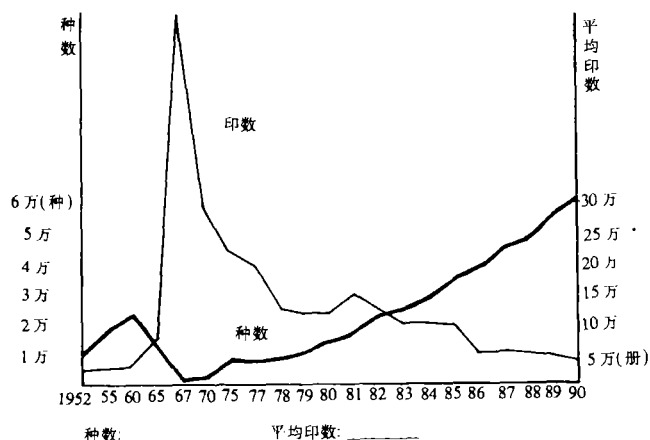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出版业和年间的两次剪刀差

第一个特征是出版书籍“种数”与每种书籍“平均印数”两条曲线的背离,如图1所示。出版种数曲线(粗线)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自50年代至60年代呈上升趋势,60年代至十年动乱时期急剧下降,1977年后逐年上升;而平均印数曲线(细线)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自60年代初叶至十年动乱期间骤然上升,自1977年始逐渐下降,特别是自1985年以后,在种数继续坚挺的情形下,不仅平均印数,而且总印数、总印张都发生了全面的滑坡。中国40年出版业的历史中出现了上图所显示的种数与印数的两次剪刀差,前次以十年动乱的高潮1967年为代表,表现为印数高、种数低的巨大反差;后次正发生在当前,且未有回收之势,表现为种数高印数低的反差。这两次剪刀差后面的原因是深刻而耐人寻味的。

1967年,十年动乱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仅出版书籍1 500余种,只达到1950年的四分之一,是1950~1990年40年中最少的一年。但每种书的平均印数却高达122.3万册,高居40年之首。这一年,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类别中的书籍种数也均为40年之最低,而每种平均印数也均为40年之最高。以此为代表的这种反差,说明了只有在一种单调的文化气氛下,只有在知识文化产品种类奇缺的情况下,以及借助政治强权的作用,每种书籍的平均印数才会高达120万册以上。这绝不意味着社会文化的繁荣,相反它表现的是一花独放,百花雕零。而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社会思想、文化、审美的多元化、多样化,随着书籍出版种数的激增,我们不可能期望每种书的平均印数能达百万或几十万。因此从大的发展趋势上看,种数增多,平均印数下降,带有某种必然性。

但是,这种多样化的趋势及其导致的近年来书籍种数的增多,可以解释80年代初叶书籍印数较之70年代的下降,却不能解释1985年以来种数与印数剪刀差日益加剧及总印数、印张的全面下跌。这种下跌另有原因在。那就是近年来我国的图书业正在从产品生产转变为商品生产。我们还未适应这一变迁。1990年中国图书业出版图书6万余种,其中初版4.5万种。仅从种数而论,我们已进入了世界前五名图书大国。但是自80年代下半叶起,中国图书业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六七十年代由于书籍种数稀少,我们不需要信息渠道,而今天却必须寻找打通商业信息渠道的手段。过去由于写作队伍狭小,由于出版盈亏由国家包办,我们的书籍市场无竞争,而今天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实质上仍然无竞争,出版内容上重复极大。一本高质量的书籍打不垮同一范畴内一本低质量的书籍,因为渠道不通,使两者不能交锋。唯一的竞争

(下转第23页)

也就是说,交叉的发生不再仅仅局限于两门学科之间,而是出现了多门学科之间的复合交叉;不再仅仅是中心学科向边缘学科的单向渗透,而是出现了中心和边缘学科之间的双向作用;不再仅仅是个别概念、原理的生硬移植,而是出现了普遍的方法、规范、信念等科学精神的无形交叉。

上述发展意味着交叉学科正在日益成熟。标志有二:

其一,交叉学科的研究规范逐步形成。交叉学科是在原有学科割据的空白地带建立的“新国度”,需要有自己的疆域、语言和法规,即研究规范。这种规范是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全体成员在工作中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交叉学科价值的具体体现。从发生过程看,交叉学科起初并没有新的研究规范,从事有关研究的人员往往习惯于使用原来学科规范,不仅用原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用它去评价在同一领域工作的新的同行。这样,不同规范之间就出现了比较和斗争。久而久之,旧有的规范逐步变形、杂交、融合,并形成了统一的新规范。

其二,交叉学科体系基本形成。最早出现的交叉学科分支是所谓边缘学科,是由两门或多门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而在其边缘地带形成的。本世纪40年代,随着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产生,交叉学科领域又出现了所谓横断学科。该学科是以各种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形式的某个共同点为研究对象形成的。70年代以后,由于人类日益明显地面临一些重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等,这些问题必须用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才能解决,于是,以特定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学科应运而生。这样,交叉学科就形成了以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为主要分支的学科体系。

目前,交叉学科正从科学中的亚文化转变为主流文化。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交叉学科的成熟发展,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克服主体的局限性,不断克服人类与其所处环境的对抗性,不断克服思维及其工具的功能专一性和单向性,在科学认识多样化基础上,逐步实现着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整体把握和综合协调。在实践意义上,交叉学科的成熟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应用研究的相互渗透和直接转化,使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少基础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在应用科学、技术科学和生产实践中作出预见并得到广泛应用,从而加速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为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提供了保证。

(责任编辑 孙立明)

(上接第61页)

争只在挖掘新的选题。于是到处是浅尝辄止、粗制滥造。市场的一切弊端在我们刚一尝试时就全部领略了。而市场的积极功能却还没有被我们发掘出来。我们没有自己的大畅销书,没有自己实力雄厚的出版社,更未能产生出一批世界水平的中国书籍。由于种数的激增与印数的暴跌增加了出版业的经济风险,进而导致了出书难—买书难的不可思议的困境。学术著作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出版业发展变迁中的另一重大特征是通俗类书籍种类与数量的激增。

1987年以前中国书籍出版的统计大致按四类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自然科学、技术类。虽然哲学、社会科学类、文学、艺术类书籍已包含通俗读物,但文化、教育类(1978~1987年的书籍统计中不包括大中小学课)书籍中通俗读物的含量最高。1978年以来,各类书籍的出版种数均有增长,但文化教育类增长倍数远高于其他类书籍(见表7)。1978年时文化教育类书籍的出版种数仅占全部书籍出版种数的8.8%,1987年时高达30.4%。1978年时文化教育类书籍的印数仅占全部书籍印数的23.8%,1987年时则占68.8%。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俗书籍开始充斥中国图书市场。

表7 1987年出版书籍种数与印数与1978年出版书籍种数与印数的倍数关系

	种数	印数
总计	5.1	2.5
哲学、社会科学	4.4	1.1
文化、教育	16.0	7.3
文学、艺术	4.7	1.7
自然科学、技术	3.3	0.8

这一变化的原因与近年来种数上升印数下跌的剪刀差之原因一样,同为图书走向市场,成为经济的产物。而书籍出版中通俗读物占据了压倒优势,更是中国图书事业自古未有之巨变。除去课本外,中国历史上的书籍出版中,从来是精英文化占压倒优势。宋明时代的话本、小说虽印数可观,但在种数及以种数为基础的总印数上不能与经史子集诸类精英文化的总量匹敌。今天,西方社会学家早就开始认真对待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终于也在中国泛滥。它们冲击,压迫着精英文化,对后者构成严酷的挑战。

中国图书业在发展,中国图书业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有赖图书业养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正视和思考这一难题。

(责任编辑 蔡德诚)